

南京党史資料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辦公室

南 京 市 檔 案 館

22



南京党史资料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

南京市档案馆

22

一九八八年九月

封面题字：武中奇
责任编辑：成东红

南 京 党 史 资 料

(22)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

南 京 市 档 案 馆

南京金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4 字数81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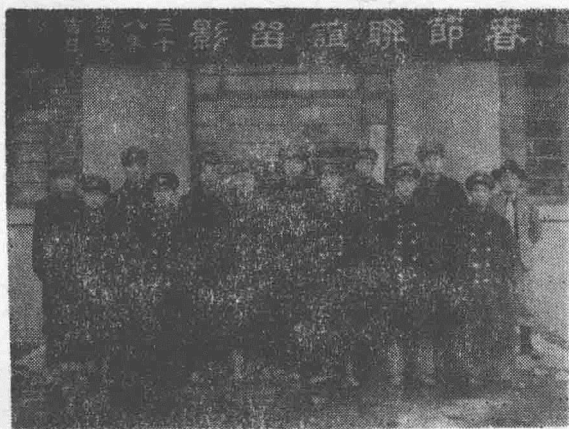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报刊准印号：(JS)字第3185号

定价：0.90元

←一九四九年春节，南京邮局鼓楼支局地下党员花义和、倪建南与职工结拜十三把兄弟合影



↑ 1948年邮局同仁五五聚餐会合影

目 录

专题综述

开展警察运动 配合南京解放

..... 南京市公安局史志组 (1)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金融战线的革命斗争

..... 顾公泰 张士雄 (23)

蒋王朝后院起火 财政部带头请愿..... 王 希 (38)

回 忆 录

差工怒火..... (46)

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

——忆解放前南京邮局职员的革命活动

..... 沈以行 汪璜 (63)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的地下斗争..... 张士雄 (74)

解放前南京邮汇子弟学校与伞兵子弟学校

——中共南京地下组织的隐蔽点..... 张一之 (85)

中共南京市委文委新闻分委的建立与斗争

..... 丁又川 姚北桦 (92)

忆《金大新闻》..... 冯世昌 何开庸 (102)

- 一潭死水起波澜……………张志明(106)
- 开展多种活动 把同学吸引在党的周围……………(111)

革命史迹 介 绍

- 张荣森与南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刘德源(118)

缅怀先烈

- 忆汤万益烈士……………周 静(122)

诗 歌

- “五·二〇”战歌(七首)……………朱成学(128)

开展警察运动 配合南京解放

南京市公安局史志组

一、首都警察厅是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工具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为了发动内战，保障其政治、军事指挥中心的安全，竭力扩编“首都”的军警宪特机构，加强法西斯统治。他们派国民党军委会二厅中将韩文焕，三十一军中将副军长、国民党中执委委员黄珍吾，充任内政部直轄的首都警察厅的正、副厅长，韩、黄二人还从重庆带来了310名亲信骨干。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十弟兄之一，兼蒋介石的特别警卫组组长），还陆续派军统少将组长等骨干分子200多名进首都警察厅，掌握许多重要职位。改组后的首都警察厅，内设五室（办公室、外事警察、人事、会计、统计）、五处（特警、督察、刑警、行政警察、总务），还有直轄保安警察总队、特别警备大队、刑事警察队、驻卫警察总队、消防总队、警察学校等。厅下设东区、南区、西区、北区、

中区、下关、水上、东郊、南郊、西郊、北郊、浦口和汤山13个警察局，84个警察派出所。在员警方面，除留用少数汪伪警察外，又从黔、鲁、豫、赣、苏、皖、平、津等省市招考中学生，经中央警官学校或首都警察学校训练后委任为警员，分派各所统管户口调查、巡逻守望、临时检查、非常警备、交通管理等任务，实行全国仅有的“警员制”。全厅共有官佐员警9798人。

在各区中，东区是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西据市中心，东扼中山门、太平门、光华门，出城与中山陵区紧连，向东延伸至汤山“中央训练团”及兵营，控制京杭国道（即今宁杭公路），在各级警察机构中密派了一批军统特务作为骨干。北区为外交使馆和官僚公寓，派驻有大量的保安警察和外事警察。中区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这是金融的中心。南区所辖中华路、三山街、夫子庙一带商业区，人口稠密，警所较多。西区毗邻辽阔的西郊，紧沿长江、内河，多系城市贫民、小商小贩和菜农。下关、浦口及长江两岸，为津浦、京沪铁路起点站，车站、码头密集，是水陆交通命脉，居民多系铁路、轮船、电厂等产业工人和船民、苦力，警力布置甚多，统治较严。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由于我军强有力地反击，他们不仅在军事上连遭惨败，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也出现了严重危机。于是他们变本加厉地强化特务统治，警察厅在派出所实行“警察勤务区”，每区设警察一人，并将若干勤务区合成一个“联勤区”。同时，“加强警备

力量，培养警察耳目”，在全市普遍组训了民众自卫队、防护团和义务警察队，厅、局长兼任团、队长，推行“联保联坐法”，加强社会面的控制，以发现和监视“异党”、“共嫌”活动，迫害进步人士，破坏革命运动。警厅除设机要室、督察处、外事警察室、刑警队党政组、社团组专司特务情报工作以外，还在各级警察机关内部秘密建立“调查组”（后改为情报组）、“情报搜集所”、“防奸保密小组”。在单位内部和公共场所设置秘密坐探及耳目，搜集各种情报，整理进步员工黑名单，密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政部、首都卫戍司令部、党政军联络秘书处等反动首脑机关。

二、采取多种办法，开辟警运工作

南京党组织对旧警察机构开展工作，是从1946年夏天开始的。我新四军淮北办事处敌工部的“反攻同盟会”会员王荫民同志（安徽凤阳县人），趁首都警察学校在蚌埠招生时投考来宁。他与市委工委的党员纪浩接触过程中，经纪浩教育培养，由陈慎言同志批准，于1947年3月入党。后来市委将王荫民的关系转给负责搞警察工作的马文林同志，从此党组织就能够了解首都警察学校内部的情况。马文林根据当时国民党搜刮民脂民膏，大打内战，苛捐杂税很多，物价一日三涨，劳动人民和公教人员生活日趋恶化等情况，便叫王荫民在警察学校内“通过经济斗争，扩大政治影响，争取进步群众，在斗争中谨慎建党，发展组织。”王利用学警因生活津贴费太少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抓住所在中队队长庾传新用学警津贴费去做投机生意的

把柄，发动全队学警起来找庾算账，逼迫校长将庾调走。这次斗争取得胜利后，其他中队的学警也纷纷起来与克扣生活费的中队长进行说理斗争，迫使那些一贯骑在学警头上作威作福的“上司”的行为有所收敛。

1947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在1946年底召开伪国民大会抛出伪《宪法》之后，又在1947年2月底强迫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撤退，并向延安发动进攻。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政府法西斯面目，使它在政治上彻底孤立，经济更加陷入危机，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深刻不满。广大群众日益把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在我党的身上，并程度不同的投入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中指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独裁、内战和掠夺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罢工、罢课、民变运动不断发生，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将日益向前发展。周恩来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中也指示：“同时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

南京的党组织根据中央的这些重要指示，因势利导，发动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发动了“五·二〇”运动，得到上海、杭州、苏州、北平、天津等十几个大城市学生的声援，展开了联合行动，在全国造成巨大的声势，形成了

反蒋的第二条战线，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为了配合学运、工运的斗争，搜集敌人镇压革命运动的情报，控制地方武装实力，市委决定抽调专门力量，深入开展警察工作。当时我党对首都警察厅的政治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巡官以上的警官多系军委会、内政部、中央警官学校派来的骨干，但在大多数的员警中，除留用的汪伪警察外，其基层队伍，一部分是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中央警官学校初级干部训练班受训一年结业的警员。他们为警校招生简章上写的“为抗日培养人材、毕业后以初级警官任用”所诱惑，可是，抗战胜利后，离乡背井来到南京，穿的是粗呢警士服，戴乌龟壳（指白钢盔）、站大岗，他们深感受骗。在我党发动学运、工运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他们于1947年5月举行过罢岗和游行、示威，争得“委任警员”的空衔，但并非都是死心塌地“效忠”国民党的。另一部分是从首都警察学校分来的学警，他们多系国民党发动内战后，由于百业凋敝而失学失业的中学生，因走投无路，没有办法才当警察。这些人薪饷微薄，家庭负担又重，寅吃卯粮，感到前途渺茫；其中有些思想活跃的，目睹国民党卖国独裁、贪污腐败等种种丑恶现象，加之受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影响，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日益不满，渴望早日摆脱困境，这部分人是我党争取的主要对象。因此，市委决定，从工委系统抽调过去在上海搞过警察工作的马文林同志专门从事警运工作，并陆续抽调地下党员金广臣、王继贵、郝佩臣、汤待英、刘庆生、金同福等同志协助开展工作。

1947年夏，首都警察学校第二期学警即将毕业时，马文林

要王荫民利用安徽籍同乡同学的关系，组织了“皖警联谊会”，以便在这些学警分配工作后进一步进行联络活动。为了争取合法地位，聘请了警校教育组长傅维新(安徽人)任该会理事长，王荫民被选为常务理事兼联络组长，并安插了积极分子、安徽籍学警李玉美、易潜(这两人后来均被发展入党)为该会骨干，初步在警校建立了一个团结进步群众进行斗争的核心。

当时蒋管区物资缺乏，物价暴涨，国民党政府实行食品配给制度。每月发给配购券，分红、绿两种，“红票”比“绿票”增配公价的米、面、布等日用品，油、盐、糖配量也多一倍。1947年秋，首都警察学校第二期学警毕业，分配前有三个月实习期，校方宣布在实习期只能领用“绿票”，实习期满才换发“红票”。可是，在实习期满后又不食言，不发“红票”，学警多有怨言。地下党员王荫民等即以“皖警联谊会”的积极分子为骨干，发动几百名学警到警校集会请愿，进行抗议，掀起了争“红票”的斗争。警校负责人要尽推诿、哄骗的手段均无济于事，后来被迫与学警代表一起到内政部谈判，内政部长次长胡次威只得答应补发。在争“红票”的斗争中，培养锻炼了一批积极分子，后来王荫民将其中的孙洙(当时名叫朱树勋)发展入党。

1947年11月初，上海民盟中央将学运中暴露的骨干杨辉同志介绍来南京，市委将他交给马文林同志领导，同年12月，杨经马文林介绍入党。杨在西郊警察局新河口派出所当警员的同乡王松的家落脚，争取联络在敌控制较为薄弱的西郊警察局工作的同乡同学。经过三个多月教育、启发，王松于1948年2月

被发展入党。杨辉又通过王松在警员中积极串连和物色建党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在实际工作中考核，到1948年10月，经组织批准，在西郊、南郊、下关等警察局、所，先后发展了郭家福、赵圣范、冯福成等人入党。之后又由郭家福介绍了宋锡光、赵光明等人，赵圣范介绍了赵仿吾、周群中、李炎钧等人，李炎均又介绍冯英等20多人参加了党，从而开辟了新的阵地，为后来进一步联络下关、水上警察机构中的进步力量和开展各项斗争打下了基础。

三、建立警察运动委员会

1948年9月21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中指出：“为了执行党的总任务，认真做到在充分准备、抓紧时机、跳跃发展的方针下，加强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争取群众的优势，建立战略堡垒，深入敌人心脏，来有效地发动第二战线作战和加强支援解放战争”。市委认为，对国民党警察中的多数下层人员可以做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他们起义，以便在解放军解放南京时起里应外合的作用；在敌人弃城逃跑之际，可以组织他们维持社会秩序，这是一支可资利用的重要力量。两年来，我们虽然在警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形成一些秘密据点，但力量尚弱，远远不能控制全局，因此，市委作出了进一步加强警察工作的决定，于1948年10月成立了中共南京市委警察运动委员会（简称“警运会”），在市委副书记刘峰和市委委员兼工委书记陈慎言的先后领导下，由陈良、马文林两同志分任正、副书记。为了充实骨干，聚积力量，加强领导，市委先

后从工委系统抽调黄河、丁熊同志，从店员系统抽调邓德明、陈铮、周静芳(女)、胡化楠等同志，从军运系统抽调李昭定、陈志宣、谢锦生、翁士毅，以及由李联系的安庆市安徽大学地下党员刘玉浦、朱蒋生、季道元(女)、尤继安等同志；1949年2月以后，又从徐州军运系统调来徐南、王励明、苏新同志，从南京学运系统调来曹汶、焦维和同志，分赴各区，与埋伏在警察机构内部的同志秘密联系，并肩战斗，以加速开展警察工作。

警运会成立以后，积极贯彻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继续为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而斗争”，“坚决地向着(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党政军机关特别是前方和后方的部队，特工系统等扩大我们的力量”的指示和市委的部署。一方面，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巩固工作，普遍进行了时事、政策、政治、思想教育，秘密工作技术，斗争策略和气节教育，以站稳脚跟，巩固阵地；另一方面，在警察机构的基层继续发展党员，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其中、上层人物中积极进行分化、争取和策反工作。1948年10月，南京市委公务员系统的党员刘胜鉴同志通过友人左健东认识了原任内政部警察总署专员的张澍作为工作关系。通过在工作中考察，刘认为张澍原与我党有过关系，后来虽在国民党政界任职多年，但是几经起落，与蒋党貌合神离，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影响下有重新革命的可能，而且张认识警察界不少头面人物，可通过他做上层的策反工作。于是刘胜鉴要张写了自传，经组织审查，发展张澍入党，并将张澍的关系交陈良同志直接领导。张在入党后，先后发展了内政部警察总署编审

兼外事教官袁友秋、人事室科员周忠珩、内政部人口局科员庞凌魁等入党，而后由他们陆续分头发展了中央警官学校助教陈勃、首都警察厅督察处服务员李鼎成、水上警察局刑事课长林大宗、北区警察局实习巡官兰荣衡和阴阳营派驻所所长李虎俊、北郊警察局八卦洲所巡官萧绍基以及当时被遣散的原山东省历城县警察局局长李继增入党。此外，还将原在北平市警察局任巡官来南京后赋闲的赵守荣作为工作关系。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我党在敌警中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开展，到南京解放前夕，警运会系统共有地下党员124人。其中属于组织上指派和从工委、学委、店员和军运系统抽调来的党员骨干25人，属于内政部警察总署、人口局和警官学校等部门的8人，属于首都警察厅的91人。在首都警察厅的地下党员分布情况是：东区9人，西区8人，南区3人，北区2人，中区7人，下关6人，东郊2人，西郊29人，南郊5人，北郊2人，水上15人，厅本部3人。另外，警运会掌握的工作关系共有95人，分布厅本部、浦口警察局及各区。

四、开展情报、策反等工作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南方胜利进军，敌人进行垂死挣扎，搜集和研究敌人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的任务就更加紧迫。警运会要求每个党员迅速查报所在单位的员警，特别是巡官以上人员的来历、身份、个性、思想动向和社会关系，分出左、中、右政治倾向；同时摸清警察机构内的枪支弹药和档案资料等情况，以及各区警察局管辖范围内的驻军番号、江防部署、要塞

设施，地方武装，反动党、团、特务、会道门、青洪帮和地痞流氓头子、还乡团分子以及属地方武装性质的民众自卫队、防护团和义务警察队等情况，整理材料，向组织报告，以便市委掌握全面情况，部署工作。

警运会的地下党员在复杂的环境中，采取多种方式，搜集了一些重要情报。东区警察局的地下党员陈润田同志提供了军统局在警察厅内部部署的绝密情报，其中有东区、东郊、汤山三个警察局属蒋介石侍从室特别警卫组控制的重点；东区警察局的两任局长陈善周、江理章都是军统特别警卫组的少将副组长；太平桥、太平门、中山门、中山陵和汤山等警察所多系特别警卫组派出的特务，许多便衣特务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袁友秋同志据根党组织的指示，利用其伪职身份，收集到南区、北区警察局和首都警察学校职员的政治情况，国民党军队的考资《江防图》，中央通讯社汇编送给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看的《参料》和国民党军队调防部署、戒严口令等，提供组织上参考。

此外，中共中央社会部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派遣葛亦远同志打入军统局，抗战胜利后埋伏于内政部警察总署，长期隐蔽，单线领导，搜集情报。我华中行政办事处公安处也于1946年底派顾良琛同志来南京，利用其在首都警察厅当机要秘书主任的舅父刘启迪的关系，多方搜集情报。1948年市委学委组织的纪念“五四”晚会、“五·二〇”周年纪念会前，顾从国民党青年部获悉敌人预先布置特务、“职业学生”准备进行破坏的情报后，均报告了组织。顾还先后发展督察处服务员杨振声、刑警队邱富民和北区警察局朱养和为工作关系。